

新发现6座祭祀坑,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神秘三星堆 考古再解谜

本报记者 杨雪梅 王明峰 宋豪新

20日,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是否可以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谜题?

更清晰了解祭祀区的空间格局

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坑与2号坑完成抢救性发掘,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考古工作者很快对遗址实行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之后考古工作者一直在研究两个坑的资料,文物修复、筹建博物馆等相关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除了祭祀坑,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城址、墓葬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重启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

据介绍,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精美牙雕残件等重要文物500余件。跟1986年发掘的1、2号坑相比,6座“祭祀坑”的形制与方向相似,出土文物类似。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此次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与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址与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还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圆形小坑、矩形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这意味着过去根据两个坑的出土文物及相关考古所形成的观点都要接受新的检验与挑战。

参与3号坑发掘的上海大学教授徐坚介绍,1、2号坑发掘了大量前所未见的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改写了人们对早期文明格局和特色的认识,但两座器物坑也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此次发掘的3号坑内,器物的丰富程度不亚于2号坑,但是在器类、器形和组合上又独具特色,说明器物坑不是特殊事件的结果,三星堆的仪式活动持久而多元。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和30多年前的发掘相比,此次发掘不再仅仅满足于静态意义上的文物,而是利用种种技术手段和理论模型,动态复原埋藏过

程,从而能够对祭祀区的空间格局有清晰了解。

加深对成都平原与其周边文化关系的认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这次新发现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有助于解决学界对三星堆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断代研究等关键性的



图为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出土的金面具残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施劲松说:“一个遗址的祭祀区不是孤立存在的,生产这些器物的作坊在哪,器物在掩埋前是否正常使用,资源与技术是如何掌握的……此次新发现的器物坑,使我们有可能对整片区域的相关研究重新思考。”

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是青铜器研究专家,他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体现了三个层面的文化。一是以青铜面具、青铜神树为代表的本地特征;二是以玉戈、牙璋等为代表的夏商文化的影响;三是三星堆在吸收中原青铜技术的同时进行自我创新,比如器形是中原的尊、鬲,但风格装饰明显与长江中下游有密切联系。文化上的认同可以突破距离的限制,文化传播、交流的路线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前不愿来,现在却舍不得走了。”安徽省利辛县望疃镇草寺小学特岗教师李慧不禁感叹。学校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乡村教师的待遇也提高了,还配备周转宿舍。

近年来,我国“特岗计划”累计招聘教师95万名,“国培计划”培训中西部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近1700万余人次,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惠及8万多所乡村学校127万名教师,19万名教师选派到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支教……一支“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队伍正在成长起来。最新数据显示,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幅提升,本科以上学历占51.6%,中级以上职称占44.7%。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我国从制度上予以保障。如今,我国建成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各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累计资助贫困学生6.41亿人次,基本做到“应助尽助”。

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党的十八大以来,重点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累计招收70万人,累计有514.05万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贫困学生纵向流动的通道更加宽广。

增强贫困地区致富能力

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

“科技太重要了!没有科技支撑只能‘看天吃饭’。”说起南京农业大学的专

核心阅读

眼部有彩绘的铜头像、华丽的金面具、精美的牙雕、青铜神树……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近日发布。曾于1986年进行抢救性发掘的三星堆遗址,此次实现了科学性考古、多团队合作、多学科融合的新尝试,丰富了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及其文化的认知。

这些年,考古学家一直在对三星堆城址、墓葬进行勘探,找到了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桂圆桥文化和宝墩文化,也找到了晚于三星堆的十二桥文化,建立起这片区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漫长岁月的文化序列。

建立考古舱、多学科合作,实现考古新尝试

精美文物的发掘不能脱离考古的第一现场。全面记录考古发现的第一现场,科学采集每一种样本,尽可能地避免干扰或者污染第一现场,决定了考古的学术价值与考古成果的科学性。这也是此次考古发掘中建立考古舱的意义所在。

雷雨介绍,与1986年相比,此次考古是把先进的实验室等搬到田野考古现场的新尝试,具有里程碑意义。恒温恒湿的考古大棚、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文物应急保护平台、可以远程传输数据的专家会诊室、考古工作全程记录系统、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工作视频记录系统……技术保障使得发掘与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成为可能。

考古舱中设立了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配备了低温保湿柜、生物低温采样箱等设备,可对出土的角骨蚌牙、纺织品、漆木器开展应急保护。在5号坑采集的象牙样本要接受记录检测和扫描,在放大镜下能够看清美丽的回形纹饰。还设立了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配有离子色谱、整体提取设备,可对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器进行应急保护。

20世纪8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宋新潮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一直强调集中优势力量攻关重大问题,30多年来,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从未停止,也提出很多疑问、展开很多讨论。如今,我们对于成都平原的历史了解得比过去清楚,学术准备和技术准备更充分,多学科合作能够组织起来,我们也欢迎国外考古人加入,共同研究充满挑战又随时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三星堆文化。”

“如果不是对口支援,我真想象不出大海有多美。”得益于“临夏—厦门”携手合作,甘肃省临夏市第三中学的王奇荣跨越2000多公里,和同学们来到厦门开展研学实践。

“如果没有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走出大山。”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李红斌掌握了一技之长,还在省市级比赛中获得汽车喷涂项目奖项。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依托“国培计划”中小学教师领航工程,发挥师资优势,选派200余所领航工程成员学校共880余名教师到四川省凉山州支教,覆盖凉山州14县市90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精准帮扶、快速提升凉山州各县的教育教学质量;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与中国教育基金会,联合国内卫生类职业院校、6家企业,为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职教中心制定护理专业帮扶方案并筹集资金,目前涵盖基础护理、重症护理、妇儿护理、急救等领域的实训设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全国一盘棋,教育脱贫攻坚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职业教育让人掌握一技之长,不仅点亮了贫困家庭子女的人生梦想,也有力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改写了贫困家庭的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有800多万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目前,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原本是低保户,如今拿高工资”的故事越来越多。

不会普通话,就难以走出家乡、到外地工作,脱贫也就难以实现。2018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率先实施“学前学会普通话”试点,覆盖了全州29万余名学前儿童。目前,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80.72%,推普脱贫攻坚累计开展350余万人次农村教师、青壮年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明显增强。

不让一个群众因贫掉队 让全体人民共享教育改革发展成果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教育脱贫攻坚力度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的。教育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我找到工作,多亏了学校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的精准帮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学生杨圆圆表示。“县教体局同志给买了羊,又修了圈,今年估计能增收近两万元。”河南省沈丘县范营乡八里棚村贫困户孙运东得到“专属扶贫小分队”的精准帮扶,对未来发展充满希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下一步,我们要守好控辍保学防线,义务教育保障线、教育质量底线、乡村振兴支撑线、思政工作安全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持续振兴。”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不让一个群众因贫困掉队!教育脱贫攻坚践行

会后探落实 四问校外培训③

核心阅读

发展无序、超纲教学、收费混乱、虚假宣传、安全隐患……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种种乱象,直指监管。而监管对象分散、培训需求旺盛、涉及部门众多等因素,都增加了监管的难度。治理校外培训乱象,需要标本兼治,握指成拳,同时也要切实解决好学校内、课堂内教不到位的问题。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有关部门和各地共同努力下,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但在一批不合规的机构被整顿、关停的同时,内容超前超标、虚假宣传、乱收费等现象仍屡禁不止。

按下葫芦浮起瓢

说起培训机构“卷钱跑路”,江苏省南京市的张女士气愤不已。2019年,她给女儿报名了一家自称“高端国际品牌”的培训机构,存了上万元的课时费。

“前一天还好好的,没有任何征兆,第二天就人去楼空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1万多块钱打了水漂。”张女士感到困惑,“家长们维权艰难,听说和我有相同遭遇的家长还不少,培训市场到底怎么了?”

2018年8月,国办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系统性文件。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各省区市也开始专项治理,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

但令人担忧的是,在校外培训机构整治过程中,一些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甚至滋生出新问题:一些培训机构从“地上”转为“地下”,明着被关停,实际上“改头换面”重新营业;一些培训机构师资队伍良莠不齐,有的甚至不具备教师资格;尽管三令五申,培训机构参与招生录取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课外班的乱象,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目前,已然形成了由补习机构、线上教辅平台等相关群体组成的利益链条。”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调研发现。

这样的现象需要引起警惕:一些在整改中“下马”的培训机构悄然转移到线上,提前学、超前教、虚假宣传、乱收费等现象也随之转移到线上。与线下培训相比,线上培训具有生源、师资分散的特点,既难于监管,也难于整治,很多地方尚未出台具体整治细则。

痼疾在标也在本

1月7日召开的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表示:“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这个难题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态难以形成。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

要想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必须把因果链搞清楚,把责任链理清楚。培训机构乱象之所以成为顽瘴痼疾,其监管难既难在“标”,也难在“本”。

从“标”上看,校外培训机构整治既属于教育问题,又需要各部门综合治理,涉及市场监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公安、应急管理、卫生、网信、文化等部门,“九龙治水”,职责交叉。整治过程中,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线下要求不达标,就转战线上;超前教学不允许,就“阳奉阴违”……

从“本”上看,校外培训是很多家庭的“刚需”。孩子需要补课,家长没有精力和能力辅导,不报培训机构怎么办?下午3点半放学,家长没有下班,不上“托管班”孩子谁来接?别的孩子都报班,自己的孩子不报,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因此,在整治校外培训机构过程中,甚至出现“家长打掩护、上课‘对暗号’、培训转‘地下’”的怪现象。

当前,校外培训市场上,不仅有大机构、小机构,更有很多“单师单科培训”,自由职业者、体育艺术特长生、高校学生等都能成为老师,监管对象分散、数量多,也给规范化管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教育部门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培训机构为全日制学校提供优质规范的教育资源,在学校特别是薄弱学校的教学革新、课程研发、管理优化和课后服务等方面,在校内消化人民群众‘培优补差’的‘刚需’。”全国政协委员胡卫建议。

握指成拳解难题

“北京市已经研究出台相应的规范和引导。一方面是办学资质、办学标准以及疫情防控的要求;另一方面,市教委将进一步加强对教师资质、超纲超前教学、教学质量不高,特别是预付费资金、培训服务合同、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监督,坚决堵住隐患。”前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

培训机构具有鲜明的教育属性,直接关系到立德树人的成效。这也意味着,需要对其在办学许可、登记、收费、广告宣传、安全、卫生乃至食品安全等方面严格监管,划出“红线”,明确“底线”。

在教育教学方面,亟须督促校外培训机构遵循教育规律。“我呼吁,尽快在市级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平台,将所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师资情况、开班情况、学生名单、培训内容、任课教师、上课时间统一录入平台。”浙江省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说。

同时,亟须对培训机构师资队伍师德师风作出监管,不但要审核其资质,更要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等各方面对其严格要求。

“治理的力量要注重统筹,进一步明确市场监管、民政、发展改革、财政、公安等部门的责任,共同发力,力争取得重大突破。”陈宝生强调。

“九龙治水”如何变成“握指成拳”?有专家建议,可以建立由教育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大力推进。同时,需要充分发挥相关行业协会在行业发展、规范、自律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合力。

“要坚持眼睛向内抓治理,校内教育教学安排、管理服务要调整,要跟上,切实解决好学校内、课堂内教不到位的问题。”陈宝生表示。

乱象屡禁不止,整顿难见长效,校外培训监管难题待解——

要深挖病根,更要对症下药

本报记者 张烁